

世界经济“反思与镜鉴”译丛

RETHINKING THE WORLD ECONOMY: A TRANSLATED SERIES OF STUDIES

创新性变革

开启一场经济复兴

INNOVATIVE

START CHANGE

AN ECONOMIC [英] 菲尔·马伦 (Phil Mullan) 著

徐 粟 欧阳瑾 译

RENAISSANCE

石油工业出版社



创新性变革

开启一场经济复兴

INNOVATIVE

START CHANGE

AN ECONOMIC

[英] 菲尔·马伦 (Phil Mullan) ◎著

徐 粟 欧阳瑾◎译

RENAISSANCE

石油工业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导致西方世界主要经济体停滞不前的原因，将经济危机带回到最基本的层面。书中分析西方是如何丧失其经济活力的，又将如何恢复其经济活力？本书内容均为严谨的分析和丰富的参考资料，不仅精辟地描述了僵尸资本主义，更勇敢地挑战了宿命论的正统观念，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经济停滞，更难得的是为我们介绍了改变这一状态的出路。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表明，当下需要一场新的工业和技术革命，结合经济重组，才能摆脱经济萎缩，提出把世界从长期的经济衰退中解救出来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性变革：开启一场经济复兴 /（英）菲尔·马伦（Phil Mullan）著；徐粟，
欧阳瑾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9.7
（世界经济“反思与镜鉴”译丛）
ISBN 978-7-5183-3342-4

I. ①创… II. ①菲… ②徐… ③欧…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2853号

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to Start an Economic Renaissance
by Phil Mullan

© The Policy Press 201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本书中文
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本书经英国The Policy Press授权石油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9-4374

创新性变革：开启一场经济复兴

[英] 菲尔·马伦（Phil Mullan） 著 徐 粟 欧阳瑾 译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二区1号楼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

编 辑 部：(010) 64523766 图书营销中心：(010) 6452363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740×1060毫米 开本：1/16 印张：23

字数：420千字

定 价：5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世界经济“反思与镜鉴”译丛》

编委会

主 编：卢周来 孟 捷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为民 马黎明 王高峰 卢 荻

朱安东 刘志国 李 玲 李秀铎

邱海平 张小飞 张忠任 张晓凌

周明生 胡乐明 胡建国 钱 筠

陶光远 龚 刚

总 序

从历史粗线条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每一次大的变革与转折，都无不伴随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相互激荡。而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也随着全球资本的扩张，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与制约。这其中，有两次特别大的机缘。一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彻底改变了自1840年以来国家左冲右突仍不得其道的状况，且在彼时特定的世界格局下，引导中国经济选择了计划经济与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自我循环；另一次是现代西方经济思想不断涌入且影响力日增，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本土文化资源一起，逐渐塑造了经济理论界新的生态，中国经济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并与世界经济日渐融为一体。两次大的机缘背后的历史动因，都无非是内部形势使然与外部环境倒逼，需要引入新元素，来冲破已教条化的旧思想所形成的禁锢，为寻找新路进行思想的再启蒙与再解放。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资本主义与市场体制一度凯歌猛进，以至于乐观的西方理论家先是提出“危机终结”理论，后干脆提出“历史终结”命题。然而，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中断了关于资本与市场的种种神话。历史也再次表明，任何一种思潮，无论曾经如何应运应时应景，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而是变成了刚性的教条，就可能变成发展的障碍。“势比人强”。当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地不断触发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之后，西方学界亦开始对资本主义与市场体制再度进行反思，一度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历史学派以及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思想资源，重新被重视，被挖掘，被援引，并且已经蔚然成大观。可以预

期，彻底摆脱危机的过程，将是世界经济体系激烈重构的过程，也是各种经济理论重新进行交流与统合的过程。

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引入相应的西方经济思想，既是在遭受大的挫折后对历史的一次主动选择，同时也是对世界潮流的认知与顺从。这也为中国带来了世界经济史上罕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一种清醒：市场体制始终有其固有弊端，如果过于迷信其自发力量，周期性危机必将如影随形。因为从某个角度看，经济危机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专属，不如说是纯粹市场经济体制的通病；而恰恰就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有一种思潮在不断发现与赞美“市场的伟大力量”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僵化”或者说“新教条”倾向：对政府的任何调节都予以反对，却不允许对市场予以任何质疑。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在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把握好航向。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有必要重申坚持中国“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心态，始终保持对新思想的敏感，尤其要借鉴西方学术界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最新思想成果，以防止再犯历史上有过的“极化思维”或“矫枉过正”的错误。

正当此时，石油工业出版社引入了近年来不少国外大方之家的经济学著作，其中大部分主题与上述主旨高度相关。承蒙信任，邀约我们组成编委会并主持这套丛书。我们理当尽力推介好此套丛书，希冀能为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少走弯路提供些许镜鉴，希冀以此促进形成中国经济思想界更为平衡更为良好的学术生态。

卢周来 孟捷

2019年4月

推荐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着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经济学家们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三化”政策，被众多学者视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经济衰退的问题，当前即使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通用技术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生产率、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等诸多指标却始终乏善可陈。较之反思和清算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家当前面临着更为重要的是：为何危机十年之后，生产方面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复苏？菲尔·马伦这本《创新性变革》对此进行了富价值的阐释。

在菲尔·马伦看来，从黄金三十年结束，亦即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就已经进入了类似于20世纪20~30年代大萧条一样的“长萧条”之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过只是这一长萧条过程的一次更为剧烈的表现而已。自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是商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例，都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2008危机以来至今所表现出的复苏缓慢，只不过是沿袭了长萧条的下行趋势。当前的主流分析，或者将复苏乏力问题全部归咎于金融危机，或者归结为创新的边际效率递减，都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对西方国家而言，曾经支撑了黄金三十

年繁荣的那种广泛而不受约束的经济活力已经不复存在。

经济活力的丧失，根源在于系统性的“抑制”。周期性经济衰退、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家主导的金融化，共同构成了抑制长萧条衰退趋势的力量，其最终结果是，掩盖了生产领域里的根本性问题——如投资率和生产率停滞——的严重程度，从而使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长萧条”，演变成为了一场长达四十多年的“抑制型萧条”。这种抑制过程，类似于一种治标不治本甚至饮鸩止渴的疗法——始终不让经济衰退的破坏性效应彻底释放出来，其代价则是同时牺牲了破坏性的另一面——创造性。马伦认为，“抑制型萧条”的这种抑制既有政府主动干预的成分，也有市场内在的因素。其中，周期性经济衰退通过淘汰掉一些薄弱的部门，开启暂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时期；国际资本流动，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石油美元”，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流入资本，都事实上导致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了西方国家，从而增强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恢复能力，缓解了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家主导的金融化则不仅为国际资本流动发挥了作用，也为日渐衰退的西方各国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无论是政府主动干预还是市场本身的力量，周期性经济衰退、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家金融化三者综合性抑制的总的结果，是掩盖了生产率增长乏力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抑制了真正激发经济活力的创造性破坏这一关键机制，从而使西方国家呈现出一种僵尸经济的特征。

之所以出现如此长时间的抑制型萧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目标已不再是恢复长期经济活力，而是短期内稳定经济形势。虽然增长与稳定之间有一致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因为增长总是要伴随一定的破坏性，从而牺牲掉稳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黄金三十年繁荣期间，

西方国家并不在意这种破坏性和不稳定性，只要能换来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那时西方国家“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都把未来置于优先于当下的地位”。但是进入“长萧条”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政府机构更倾向于短期的经济稳定。政府制定的政策不是去确立一种稳固的增长机制，反而是试图以此为代价来恢复经济的稳定性。然而，着力于短期内的稳定经济始终无法释放破坏性，从而也始终无法形成创造性，经济体的各种停滞特征会始终存在，并始终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最终，国家干预只能缓解经济衰退一些最严重的特征，可整个经济却已变得越来越僵化，这就形成了一种不断抑制、不断僵化的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新自由主义的主旨只是让市场释放力量同时让政府远离经济的话，将长萧条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因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恰好是政府：扶持那些无力通过投资于新技术而促进生产率的企业、鼓励和纵容金融业的畸形发展。

为什么对抑制型萧条这种低增长的乏力状态，人们越来越可以接受甚至会为之辩护？马伦指出，抑制性萧条的长期流行不仅和国家求稳定不求增长，只顾短期不顾长期的政策导向有关，而且和流行的经济学观念存在一定误导性有关。就经济增长理论而言，无论是索罗的外生增长理论，还是罗默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没有注意到资本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淡化甚至忽视了实物资产方面的有形投资的重要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流行和知识经济观念的普及，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都过分夸大了研发（R&D）投入、人力资本和市场营销等领域中投资的作用，并认为这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虚拟经济的主要投资特征。相较之下，厂房和设备等方面的有形投资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当后者的衰退被前者的投入增额所弥补时，投资就不存在衰退一说。对此，马伦花了相当篇幅进行批驳，认为研

发投入、创意、设计、涉及组织技能的咨询管理等方面的投资被纳入投资计算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如果没有有形投资，创新也好，专利也罢，研发投入也好，都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产出增加。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无形支出，尤其是研发（R&D）支出，必须与有形投资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作用。从统计观察的角度看，不仅将无形投资纳入投资总额的计算方式，而且包含了住宅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固定资本形成总值（GFCF）的统计口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经济体“活力”的衰减。只有商业投资净额，才能用来衡量提高生产率和创造优质就业岗位所需的创新投资。按照马伦的统计，美国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的商业投资净额，已经从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的近6%，下降到了如今的2.5%左右。

马伦对有形投资的强调，与其“生产率至上”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马伦在本书开篇就引用了保罗·克里格曼（Paul Krugman）在《期望递减的年代》一书的警句——生产率并非说明了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差不多说明了一切。而生产率的增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一，只有生产率的增长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满足需要的商品，同时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持续增加；第二，只有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经济活动才能形成一种自强化的正反馈，从而使增长得以持续。因为生产率增长意味着会产生出额外的资源，可用于下一轮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从而使生产率继续提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第三，只有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创新才是可持续的、并具有实质意义。因为新技术只有和资本投资结合才能实现生产率增长，而只有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经济体才可以确保研发继续获得充足的投入，研发投入则继续带来种种发现与发明。相比之下，在一种增长停滞的经济中，创新之源以及实现创新的资本投资两个方面都会受到制约，从而导致生产创新也停滞下来。

马伦认为，无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通信技术革命，还是当下被热捧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无须也不可能抱以太高的期望。“长萧条”的突出特征，不仅在于其“抑制型”，而且在于其创新范围一直非常有限。20世纪80年代至今，无论是基于ICT技术还是AI技术的创新，多集中在改变生活的消费品领域，而这类创新更多的只是扩大了我们的消费集合，通过提供新的效用类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无助于节省我们在生产社会基本必需品时所用的资源。平台经济或共享经济只是使闲置资源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生产领域的大数据技术虽然可以通过优化和重组生产工艺来暂时性地提高生产率，但很容易达到极限；在这类技术真正大展身手的金融行业，虽然有助于金融行业筹集资金或减少开支，然而这一领域的应用不会直接产生价值，也不会给生产率带来益处。简言之，只要创新不是集中在能够提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上，就会呈现出所谓索洛悖论（Solow Productivity Paradox）——迅猛的创新速度与创新对生产率的有限影响并存。

为何投资一直乏力？更准确地说，为何长萧条期间相对经济规模而言的商业投资净额一直疲软不振？马伦发现，长期以来，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处于低位的原因，并非是金融危机使企业不得不“去杠杆化”，即使是危机之后，绝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债务仍然持续增长。企业也并不是因必须用利润去偿还债务才不得不削减其投资，恰恰相反，是相对宽松的贷款可得性让企业债务出现了持续增长。这里存在的“谜之链条”在于：正是由于预期利润率的低下，以及追求财务报表完美性的动机，才使得企业审慎于长期有形资本投资，而只是依赖宽松的现金供应维系，但有形投资不足则进一步导致预期利润率低下，继续导致投资乏力和生产率提升缓慢，从而进一步恶化利润率预期。在这里，马伦高度认可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即利

利润率下降的确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马伦同时清醒地指出，马克思在刻画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时，也指出了伴随的各种反制性力量，虽然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一个几乎恒定不变的特征，但它不可能仅凭自身就导致一场经济危机。“马克思明确拒绝接受任何一种机械地或者宿命论式地解释这条‘最重要’法则之影响的观点。利润率下降现象的存在，本身并不是衡量当前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个指标。虽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利润率都在下降，但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经历了一段段漫长的岁月之后，这种下降才会在一种退行性生产崩溃中显露出来”。也就是说，马伦认为，长萧条的根本问题，在于现行制度尤其是政府政策，并未使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下降的反制性力量彻底释放出来。

马伦的著作虽然以西方国家为分析对象，但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该书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清除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仅靠借贷或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僵尸企业，如何有效提升生产率，如何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何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马伦的诸多观点非常值得借鉴。相信读者一定会受益良多。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胡乐明

致 谢

撰写本书的灵感，源自本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参与政治的经历，源自过去20年来本人在互联网与电信行业内的从业经历。这些方面，都让我获得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经历了30年间出现的那三场重大金融危机。

1996年和1997年那两年，我正在曼谷和马尼拉推广“赛伯利亚”（Cyberia）网吧的特许经营业务，因而得以充分、直接体会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几年之后，我又经历了互联网的繁荣与萧条；其时，我仍然在“赛伯利亚”公司工作，同时也是“易网”（Easynet）这家通信服务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两家企业当时都处在信息和通信革命的最前沿。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正担任“易网”的常务董事一职，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负责该公司的英国业务。

这些经历，都让我获得了种种特殊的机会，能够深入思考经济当中实体经济与金融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非常感谢下面三位引领本人进入这两家企业的人士：基思·特亚律（Keith Teare）、戴维·罗伊（David Rowe）和爱娃·帕斯科（Eva Pascoe）。他们让我拥有了这种生活，使得我在后来能够抽出时间进行研究，并且撰写本书。他们既是三位具有独创性的、成功的商界人士，也是三位敏锐的思想家，对经济、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全球性的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很多场合下，我们曾经一起探讨过这些问题。

这些反思性的探讨，说明本书首先是大家进行协作和集思广益的产物。当然，并非仅仅是与上述三位以及其他同事之间的协作。也并非只是众多作家和演说家提出的观点，才激发我更加深入地去思考西方经济乏力的这个问题。除此以外，我还与许多人士进行过直接的协作；这一点，为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许多人士在听说或者看过本书前几稿之后，都向我提出过具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本书的精华内容汲取众家之长，汇集了其他人士的智慧而成。其中，部分乃属我有意加以吸纳，更多的内容无疑是我下意识地借鉴利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本书的全部内容，或者甚至绝大部分内容，所有与我协作过的人士都会一致认同。

应当感谢的人士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我只能对下述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阅读了本书最初几稿，并且提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性的想法与建议，从而极大地帮助我完善和提炼了书中论点的人士有：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菲利普·萨德勒（Philip Sadler）、丹尼尔·本-艾米（Daniel Ben-Ami）、罗布·李昂斯（Rob Lyons）、安格斯·肯尼迪（Angus Kennedy）和米娜·托克斯斯（Mina Toksöz）。

还有詹姆士·沃德海森（James Woudhuysen）：感谢他提出的学术观点与投入的精力，尤其是在技术和创新问题上提出的意见与付出。我还要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了太多的时间，来完善我的行文风格。就算他没有彻底做到这一点，原因也在于本人具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坏习惯，而不是因为他没有付出心血。

还有我的朋友克莱尔·福克斯（Claire Fox）、米克·休姆（Mick Hume）、奥斯汀·威廉姆斯（Austin Williams）、伯恩哈德·布劳尔（Bernhard Blauel）、布里德·赫尔（Brid Hehir）、温迪·厄尔（Wendy Earle）以及我的姐姐帕特丽夏（Patricia），感谢他们的建议与鼓励。正是有了他们，我才坚持下来，度过了这个旷日持久的项目中的一段段艰难时光。

感谢我的非正式编辑加文·波因特（Gavin Poynter）和迈克·菲茨帕特里克（Mike Fitzpatrick），他们曾经孜孜不倦地替我审阅草稿、提出质疑、进行评论，并且给出了改进意见。后来，由于这一切都还不够，他们又加紧对各个章节的草稿进行了编辑。我们经常在下午聚会，喝喝茶、吃点儿饼干。对我而言，这种聚会总能让我学到东西、获得灵感和感到快乐，同时也让我对这两位极其聪明的人士形成了一定的敬畏之情，让我自惭形秽，觉得相比他们来说，我这一生当中实在是太过于孤陋寡闻了。

此外，还要最真挚地感谢我那位可爱而坚忍不拔的妻子和最佳伴侣帕娜（Para），感谢她在此过程中始终安抚我的疑虑，解决我遇到的困难，协助我撰写和出版本书，感谢她所做的一切。

引 言 西方金融危机十年之后 1

几乎各地的经济增长都陷入了停滞……这是一种新的残酷现实：
整个世界都困在了慢车道上，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经济增长为何没有复苏？ 5

“长萧条” 11

国家和僵尸经济 14

第一部分 目前的处境

第1章 衰退与复苏 23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那几次经济衰退，不仅协助淘汰掉了整个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些部门，更开启了一段暂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时期。

虚幻的曙光与错误的预测 31

“资源诅咒” 35

第 2 章 生产率衰退 37

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生产率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波动，也将交替出现的资本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阶段区分开来。

生产率为何很重要	40
生产率日益衰退	43
对生活水平的影响	46
生产率：投资与创新	50
生产率之争	55
一种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经济？	56
英国的生产率难题	64

第 3 章 创新谜题 71

大国不可能仅仅由于擅长贸易，或者由于拥有丰富的大米、小麦、煤炭、石油或货币储备，就称其为大国，更不用说仅凭这些就能保持其大国地位了。大国必须能够促进和利用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

何谓创新	76
衡量创新	79
创新与生产率	87
创新与生产	88
国家在研发（R&D）中的作用及其疏忽	90

第4章 投资为何重要 93

研究与科学会产生出新的思想，却不足以自行进步。只有通过投资，利用具有创新性的方式，实现它们为人类增添快乐或者让经济更加繁荣的作用，研究与科学才会产生社会价值。

投资总额 97

商业投资净额下降 101

为什么投资依然很重要 106

结论 119

第二部分 长萧条

第5章 利润率的问题 123

利润率的升降与经济、投资密切相关。经济学家对利润率的衡量，差不多准确地反映出了20世纪经济发展史的盛衰兴废。

投资下降之谜 126

解决投资乏力的难题 133

从繁荣到衰退：一场利润率的危机 136